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5月6日 (第190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刊：美不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是战略错误

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会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还会为其带来政治利益。美国置身该倡议之外是一大战略错误。

美专家：美选民投票率的变化趋势对民主党有利

决定选举结果的不仅在于选民投票给谁，还在于谁出来投票：亲民主党群体的投票率极高，这帮助了民主党重夺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

中美关系

限制学者交流将损害美中关系

《华盛顿邮报》5月1日载文称，据报道，美国官员近期拒绝或限制了约30名中国国际关系专家的签证，而北京也限制了一些美国学者的签证，事实上，学者交流受限将损害美中关系。

签证受限的中国学者并非对美国不友好，有些签证受限的学者实际上代表了美中关系中最有建设性的声音。而像朱峰这样的知名学者与中国政府进行互动不足为奇，类似于美国大学、智库的专家学者与美政府官员互动。尽管各国政府有理由加强国家安全，但拒绝有影响力的学者的签证可能会损害正常的思想交流。

学术界可以在促进美中两国相互了解方面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双方外交官讨论朝鲜、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等敏感话题的空间有限，而学者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可能比决策者更灵活。这样的学术交流有很多很好的例子。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创办的东北亚合作对话(NEACD)一直是美国、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日本官员和学者交流的重要渠道，为减少风险、促进区域合作提供了宝贵平台。如果学术联系受限，就可能失去类似的对话与合作机会。

学术联系受限，还可能会增加两国间的误解，导致双方做出糟糕的决策。此外，还有两个代价：美国作为高等教育领导者的形象可能会受损；美中关系的社会基础也会受损。

美国防部报告渲染中国军事威胁

CNN网站5月3日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一份关于中

国军力的报告称，中国正在继续推进军队现代化以打造全球领先的军事力量，并利用间谍活动窃取尖端技术用于军事目的。

报告称，中国获取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的手段多样，包括定向对外投资、网络盗窃、计算机入侵等。中国获取外国技术的渠道还包括技术进口、外国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合资企业、学术合作、人才招聘以及工业和网络间谍等。

报告称，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如高超音速导弹，中国已经测试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报告还详细介绍了中国国防预算和军事实力的增长情况。报告称，“中国的国防预算在过去 10 年里几乎翻了一番”。

报告指出，中国拥有“地区最大的海军，拥有 300 多艘水面舰艇、潜艇、水陆两栖舰艇、巡逻艇和特种舰艇”，中国海军是一支“日益现代化和灵活的力量”，但“中国潜艇部队的现代化仍然是一项优先任务”。报告称，到 2020 年，中国潜艇总数“可能会增加到 65 到 70 艘”，到 2020 年中期，中国将部署一艘新的导弹核潜艇。

报告称，中国政府在迅速组建海警，以加强南海主权声索。自 2010 年以来，中国海警的大型巡逻船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指挥着约 130 艘大型船只，“这使其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岸警卫队，且在多个争议地区同时开展大规模海上行动的能力增强”。

美智库：必须以军事力量对抗中国威胁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近期载文称，华盛顿需要认真思考如何长期维持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必须加强军事力量来对抗中国威胁。文章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印太地区结交更多盟友。美国应在该地区建立强有

力的联盟和战略伙伴关系，并提高区域外大国如欧洲国家对该地区事务的参与。

第二，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架构。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非正式网络。通过三边框架和双边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2+2”等机制足以实现关键协同，如建立“共同的海上态势感知”。

第三，促进经济自由。美国应鼓励该地区在所有领域实现经济自由化，包括商品、服务和投资。美国可通过双边协议实现该目标。这意味着美国应将推动美日协议、美台协议以及其他双边伙伴关系作为优先事项。

第四，建立特别关系。在印太地区，美国应与台湾、印度建立特别关系。美国应向台湾出售其需要的武器，并在外交上向台湾提供支持。印度是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长期伙伴，美国应评估并突出美印之间的共同利益。

第五，加强军事存在。美国应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关岛部署更多潜艇；以最快速度投资攻击潜艇；投资可以从航母上发射的远程攻击隐形无人机；重新在泰国建立美国空军基地；购买陆基反舰巡航导弹，部署操控导弹的地面部队。

斯蒂芬·罗奇：美国对中国的指责不符合事实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近期登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的文章称，如今美国两党罕见地站在同一阵线，把困扰美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中国，此举实际是在找“替罪羊”，与事实相悖。

美国中高层舆论界都犯了错误，对中国的抨击更多是本国问题的产物而非对外部威胁的反应。但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安全感缺失的美国已经接受了对中国的错误叙事。

以贸易为例,2018 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为 4190 亿美元,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 48%,特朗普将之视为美就业流失的罪魁祸首。但特朗普以及其他大多数美国政客不会承认,美国在 2018 年与 102 个国家存在着贸易逆差。这反映了其国内储蓄的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计后果的预算赤字方案所导致的。但显然,将中国视为阻碍“美国再次伟大”的主要障碍要容易得多。

知识产权盗窃问题上,根据所谓的知识产权委员会的说法,2017 年美国经济因知识产权盗窃而受损 2250 亿美元至 6000 亿美元。撇开这种估算异常广泛的牵涉范围,这些数字依赖于来自可疑的“代理建模”所得到的脆弱证据。

技术强制转让问题上,美国的指控是胁迫性的,与成熟的美国跨国企业会愚蠢到将核心专有技术转交给中国合作伙伴的假设密不可分,且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在“301”调查报告中承认,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些“隐性操作”。可以肯定的是,合资企业显然需要共享人员、业务战略、运营平台和产品设计。

华盛顿还将中国描绘为驾驭享有优惠政策和补贴的国有企业的中央计划型超级机构,但日本、德国、法国乃至美国长期以来都在实施类似的产业政策。2 月,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出台一项人工智能倡议,可见在将创新提升为国家政策重点的可不仅仅是中国。

最后是中国“操纵汇率”的问题。事实上,自 2004 年底以来,人民币广泛的贸易加权汇率实际已经上涨了超过 50%,中国一度极为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几乎被抹平了。

总而言之,华盛顿在事实、分析和结论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公众在接受这种错误叙事方面太容易上当受骗。强调客观性和诚实性十分必要,尤其是在当前美中关系面临挑战之际。但可

悲的是，找替罪羊显然比认真审视自我更加容易。

美刊：美不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是战略错误

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会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还会为其带来政治利益。美国置身该倡议之外是一大战略错误。

美国《政客》杂志近期载文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会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若置身之外，美国将犯下巨大战略错误。文章摘要如下：

如今，华盛顿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场难以持久的权力博弈和新殖民主义的债务陷阱外交。还有一些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继续寻求全球霸权，美中两国之间存在“新冷战”。无论持何种观点，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不以为然的态度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无论美国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数量正不断增加。近期在北京召开的峰会也表明，中国愿意顺应合作伙伴的关切，并帮助这些国家保持发展势头。虽然，美国评论家倾向于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项注定失败的计划或一大战略威胁，但该倡议的真实情况更为复杂。

“一带一路”倡议能为美国带来利益。该倡议已经为美国企业打开了全新的、不断扩大的市场。从外交层面来看，该倡议也为各国提供了机遇，帮助并引导他们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该倡议还有望促进欧亚大陆的多极化，但前提是美国参与其中，而不是袖手旁观。

“一带一路”倡议已在欧亚地区产生影响。该倡议推动了巴基斯坦、缅甸等国的现代化进程，投资还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

多元化。该倡议还引发了一场各国竞相参与的“基础设施竞赛”。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希望促进欧亚地区经济的强劲发展，就应该制定战略，将“一带一路”倡议塑造成一个公平竞争的论坛。

“一带一路”倡议符合美国的商业目标。对美国企业而言，该倡议的成员国整体上代表着下一轮全球增长，美国企业必须抓住该机遇。但美国企业参与这些高风险市场的竞争是有条件的，即这些项目具有规模利润、风险保障以及公平的商业仲裁。越来越多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官方实体能够提供这些保障，如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会带来经济利益，还会为其带来政治利益。虽然，该倡议目前只是各国与中国进行协调的松散网络，但中国将在国务院内设立一个部长级“领导小组”，负责与其他成员国的外长保持联系，这也为削弱中国对“一带一路”议程的单边控制提供了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外交变得更清晰，美国可在幕后与该倡议的成员国如韩国与阿联酋进行合作，以塑造该倡议的优先事项。从“一带一路”内部对其施加影响并不妨碍美国继续从外部参与竞争。

美国应该理解中国的担忧和利益，并利用这些因素塑造中国未来的行为，而不是一味诋毁中国。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能正确引导“一带一路”倡议，那么该倡议将有助于从中国手中分散权力，而不是将权力集中在中国手中。

美国外交

美学者：国会需重新思考对俄制裁政策

《国会山报》网站4月17日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

深研究员贾勒特·布朗克 (Jarrett Blanc) 的文章称, 美国国会应审视过去五年中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 及其对俄罗斯以及美国的盟友关系产生的影响。

美欧 2014 年以来对俄罗斯的制裁的确对俄经济造成了持久的损害, 但俄为其破坏性行动付出的代价依然很低。此外, 俄技术官员已制定教科书式的政策应对措施, 以减弱制裁的影响。通过攻击普京的“亲信”和“寡头”迫使其退缩的想法也存在漏洞。

国会目前的优先事项应该是: 首先, 制裁不是强制经济外交的唯一手段, 提高实益所有权的透明度将使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人获得地产和精英教育等资源更为困难。国会正在考虑实行此种战略, 但该努力并未融入目前针对制裁俄罗斯的讨论之中。

其次, 国会应带头与盟友协调对俄制裁和其他强制性经济手段。目前国会与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对话仅限于起草制裁法案, 未来国会应在该进程早期就与各方展开对话, 努力确定共同目标, 以建立起能够真正以多边方式实施的强制性工具。

就美国对俄政策而言, 一份更具侵略性的制裁政策可能会令人满意, 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适得其反。

特朗普与哈梅内伊之间的对抗具有高风险

《大西洋月刊》4 月 29 日载文称, 特朗普不希望陷入冲突,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也不愿伊朗经济走向崩溃, 然而, 情况似乎朝着两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伊朗国内面临严重的通胀、币值暴跌和持续的工人罢工。近期伊朗发生的洪灾更使伊朗的处境雪上加霜。此外, 伊朗每年还在境外花费数十亿美元为其地区盟友提供武器和资助, 而这项投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回报。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对伊朗进行残酷的经济施压，其目的似乎是迫使伊朗投降，或者使伊朗崩溃。2018 年 5 月，特朗普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2019 年 4 月，美国务院正式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现在，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取消伊朗石油进口豁免，以扼杀伊朗的经济命脉。如果哈梅内伊认为他和特朗普无法达成协议，或者担心等待特朗普下台会使他显得软弱，他可能会考虑重启伊朗核计划，或是对抗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与盟友，或者双管齐下。

哈梅内伊与特朗普在避免冲突和开展合作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他们面临着“囚徒困境”。正如 2015 年达成的“伊核协议”和当前与朝鲜的核谈判所表明的那样，外交的道路往往由相互威胁与局势升级铺就。虽然，谁将成为这场对峙的最终赢家仍不明朗，但在未来两年中，伊朗人民和那些受伊朗影响的中东国家的居民无疑将是最大的输家。

美专家：美国需调整北极政策以应对大国竞争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5 月 3 日发布该中心高级副总裁、欧洲项目主任希瑟·康利(Heather A. Conley)的文章称，过去十年来美国的北极政策基本停滞不前，而最大的失败在于未主动了解该地区大国竞争的战略意义。文章摘要如下：

目前，主要有三个驱动力塑造着北极地区：与俄罗斯及中国等大国竞争带来的地缘政治驱动力；环境驱动因素；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度相关的经济驱动因素。这些因素以及阿拉斯加的经济重要性决定着美国的北极政策。尽管三个驱动力持续发展，但过去十年美国北极政策基本停滞不前，仍强调科学与国际合作。

多年的投资不足导致美国如今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其他国

家正把北极列为未来具有地缘战略价值的重点区域。美国在北极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有限，将抑制经济发展。而美国北极政策最大的失败之处在于，不主动了解北极大国竞争的战略意义。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对俄罗斯或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野心做出有意义的政策回应。

目前，华盛顿承认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的足迹不断扩大，但正在允许两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地区的未来。除了“打造极地安全防卫舰” (polar security cutter) 破冰船项目，目前还没有其他重大的基础设施计划。作为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回应，美国军方正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并且正增加在冰岛、挪威和阿拉斯加的军事存在。白宫也在更密切地研究中国在北极的存在，但是研究其他国家的行动并不是在构建自己的政策。

美国及其盟友如何通过“成本强加”选项“拖垮”俄罗斯

美国兰德公司网站近期载文，分析了美国及其盟友有哪些非暴力、“成本强加” (Cost-Imposing) 的选项来使俄罗斯过度扩张和发展失衡，逐渐将其“拖垮”。

报告称，“俄罗斯从来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也没有看上去那么虚弱”，这句格言目前仍然适用。今天的俄罗斯面临许多问题，如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降低，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制裁雪上加霜。但俄罗斯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与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的竞争不可避免，因此他们对“成本强加”选项进行了定性评估。“成本强加”战略最早应用于美国对付苏联，美国通过加强同苏联的全面竞争，来提升苏联的发展成本。“成本强加”选项放到今天，

也可能导致俄罗斯发展失衡和扩张过度，进而给增添新的负担，理想情况下，这种负担会超过美国实施这些选项所耗费的成本。

报告称，最有希望“让俄罗斯透支”的选项是那些直接抓住其弱点、焦虑和优势的选项，即利用俄罗斯的弱点，同时削弱其优势。在这方面，在与美国的任何竞争中，俄罗斯最大的弱点是其经济，其经济规模相对较小，高度依赖能源出口，俄领导层最大的担忧源于政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而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军事和情报战领域。

美学者呼吁美打造全球基建领导力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经济资深顾问马修·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等近日撰写报告称，美国应通过建设更高质量的基建，成为全球基建的领导者。报告摘要如下：

当前，基础设施已然成为一大战略问题。全球对于基础设施的迫切需要，以及各国提出的竞争性的基建项目，使基建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基建关乎全球利益，并在众多方面对美国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应采取一系列大胆举措来提高自身竞争力，并在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和基建中发挥主导作用。

美国在基建中可以提供的独特优势包括：创新企业、技术专长、法治、充足且平价的能源、雄厚的私人资本、伙伴与盟友网络，以及在相关多边机构中的领导力。此外，认清美国的局限性对于成功也至关重要。鉴于财政和政治方面的限制，美国所能提供的公共资源少于其伙伴国与竞争对手，因此，确定优先事项尤为关键。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采用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框架，来确定优先事项，并有效使用美国的力量：制定一份全球基建清单，并进

行内部评估，以确定对美国经济与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项目与地区；根据该评估，激励美国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通过美国的伙伴与盟友进行密切协调；监督并鼓励那些对美国经济或安全利益不构成风险的基建。

依据该框架，美国的全球基建战略应包含以下七个因素：

第一，提出全球愿景。美国应秉持开放、透明、可持续、社会责任、地区利益和复原力等原则，并整合美国现有的基建工作。

第二，与盟友和伙伴合作。美国应该发挥力量“扩展器”的作用，并与多边开发银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及其他机构与机制开展合作。

第三，提升并引领数字领域。美国应利用其在传统与新兴信息与通讯（ICT）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和利益，防止其他国家垄断世界数字基础设施，或单方面制定管理数字基础设施的标准与规则。

第四，推动世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美国应支持基建发展，以使更清洁的天然气、液化天然气、风能、太阳能及其他有助于清洁能源的技术成为可能。

第五，促进私营部门融资。美国应充分利用其私营部门及其在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力，使更多资金流入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

第六，提升伙伴的能力。美国应加大投入，使发展中国家官员不再自动选择出价最低的投标，而是支持生命周期成本分析和针对采购决策的客观评价标准等概念。

第七，提升美国政府的专业技能与协调能力。美国应在战略基础设施领域吸收更多专业知识，并在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和负责全球基础设施的副主任的指导下，提升政府内部的协调能力。

美国政治/其他

少数族裔在美人口中的占比逐渐上升

美国 Axios 网站 4 月 29 日载文称，到 2045 年，美国大多数人口是少数族裔，这一趋势有重要影响：要么一个繁荣的国家接受其新的人口构成，要么斗争、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升级。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目前非白人美国人已经在四个州以及美国最繁华城市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自 2010 年以来，非西班牙语裔白人已成为美国 32 个县的少数族裔。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表示，明年美国 18 岁以下的人口将以非白人为主，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30 岁以下的人口将以非白人为主。

这种人口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班牙语裔和亚洲移民增加，以及非白人的出生率略有上升。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对美国的国家认同、政治和代沟产生了影响。过去几年，美国种族矛盾和反移民情绪重新抬头，美国白人经常感到多样性带来的威胁日益增长。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59%的共和党人和 46%的白人表示，大多数非白人人口将削弱美国文化。

研究表明，年轻一代和少数族裔更有可能偏向民主党，但从长远来看，人口趋势不一定有利于民主党。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表示，许多西班牙语裔白人的价值观较为保守，如果共和党转变立场，学会接纳更多的西班牙语裔选民，这可能会为该党带来新的活力。

美就业形势虽好但工人工资水平增长有限

美国 Axios 网站 5 月 3 日载文称，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就

业报告显示，美国4月份新增就业岗位26.3万个，再次超过经济预期，然而，就业形势虽好，但工人工资水平增长十分有限。

4月新增就业人数，加上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增加，将已经处于超低水平的失业率进一步推低至3.6%，创下自1969年12月以来美国失业率新低。低失业率和工作岗位增加意味着几乎每一个想工作并且能够工作的美国人现在都找到了工作，而那些失去工作或决定辞职的人，找新工作的难度可能也不大。

然而，报告显示，尽管美国经济正在继续扩张，但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家庭并未从中受益，可用工人数量较少并未推动工资水平提高。4月份工人的平均时薪只上涨了6美分，在过去的12个月里，平均时薪只增长了3.2%，这还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在美国经济从“大衰退”中复苏的过程中，收入增长缓慢一直是美国经济中最疲弱的部分。即使失业率下降、经济扩张，工资也几乎跟不上生活成本。

对工资停滞不前的失望也是加州、伊利诺斯州和密苏里州等地全国范围内工人罢工的主要潜在因素。上个月，美国东北部的3.1万名超市员工举行罢工，反对削减工资和提高保险费的提议。此外，劳动力市场的动乱凸显出，尽管国会共和党人做出了种种承诺，但共和党的减税措施对工薪阶层家庭的帮助甚微。

美媒：特朗普的最大威胁已经到来

《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期载文称，特朗普竞选连任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到来，乔·拜登（Joe Biden）不仅是民主党最受欢迎的提名者，也是最可能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的人。

拜登在两次竞选中的立场相对温和，他较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

民主党竞争对手偏右，在许多议题上较特朗普偏左。当其他候选人比谁更“进步”时，拜登独自从最大的意识形态集团获得支持。

拜登击败特朗普的潜力巨大。在 Real Clear Politics 的民调中，拜登领先特朗普 7.8%。显然，一些摇摆不定的选民对拜登感到满意。与摇摆选民交流的能力将是赢得大选的关键因素。特朗普之所以在 2016 年大选中获胜，是因为他在 18% 的不喜欢两位候选人的选民中以 47% 比 30% 的优势击败了希拉里。执政两年后，特朗普连任仍然依赖于创造出这种负面对比。这意味着，如果特朗普不能提高公众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度，就会抹黑民主党提名人，但这种策略很难对拜登奏效。

拜登的经历与特朗普形成强烈对比。共和党人视他为自由主义者，但不喜欢特朗普的选民可能会认为拜登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拜登就稳操胜券。拜登不喜欢直接的对抗，但在 2020 年大选中，拜登将不得不忍受直接的攻击，并避免作出过多让步来取悦攻击者或花过大的力气来反击攻击者。拜登在前两次大选中失利是有原因的，若他不吸取教训，初期的领先也无济于事。

尽管如此，拜登仍拥有有巨大的优势。民主党人、无党派人士和共和党的叛离者可能会将拜登视为最大的希望。如果他明白这一点，一年后他将获得提名，并将是可能赢得选举的重要人选。

美专家：美选民投票率的变化趋势对民主党有利

决定选举结果的不仅在于选民投票给谁，还在于谁出来投票：亲民主党群体的投票率极高，这帮助了民主党重夺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都市政策项目高级研究

员威廉·弗雷 (William H. Frey) 的文章称, 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公布的有关 2018 年中期选举的数据表明, 决定选举结果的不仅在于选民投票给谁, 还在于谁出来投票: 亲民主党群体的投票率极高, 帮助民主党重夺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文章摘要如下:

2018 年中期选举的结果众所周知, 民主党凭借“蓝色浪潮”控制了国会众议院和多个州的州政府。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揭示了“蓝色浪潮”背后的原因: 亲民主党投票群体的投票率极高。这些数据来自人口普查局当前人口调查 (CPS) 中的投票情况附录, 反映了全国和各州关键人口群体的投票率情况。

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 2018 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为 53.4%, 这是自 1978 年开始统计选民投票率 (每 100 位公民中投票的人数) 以来, 在历次中期选举中达到的最高水平, 也是自 1982 年以来首次超过 50%。

总体而言, 白人选民的投票率高于其他群体, 其中白人大学毕业生的投票率最高、涨幅最大。在全国范围内, 该群体在中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的众议院候选人。此外, 主要族群的投票率都有所增长, 但涨幅最大的是亲民主党的西班牙语裔和亚裔, 较 2014 年增长了 13%。

去年 11 月投票给民主党的一些团体的投票率出现了最大的涨幅。18 至 29 岁年轻人 (最支持民主党的年龄段) 的投票率从 2014 年的 20% 上升至 2018 年的 36%。其中, 西班牙语裔和亚裔年轻人的投票率翻了一倍多, 白人年轻人的投票率几乎翻了一番。后者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 因为不同于 2016 年总统选举, 在去年中期选举中, 该群体与其他族裔的年轻人一样支持的是众议院民主党候选人。

一个相当普遍的趋势是年轻人投票率上升。根据人口普查结果, 除肯塔基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外, 所有州的年轻人投票率都有所上

升。2018 年，包括华盛顿州在内的 31 个州的年轻人投票率超过 35%，而在 2014 年，没有一个州的投票率达到这个水平。2014 年至 2018 年，年轻人投票率涨幅最大的是密苏里州、佛蒙特州、新泽西州、田纳西州、罗德岛州、弗吉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

2014 年至 2018 年，除了路易斯安那州和缅因州外，其他所有州的非白人人口投票率都有所上升。总体来看，2018 年 39 个州的非白人人口投票率超过 40%，而 2014 年只有 14 个州。尽管如此，除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外，所有州的非白人选民的投票率仍然低于白人选民。

选民多样性的增加在很多州都很明显。自 2014 年以来，以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和特拉华州为首的大多数州的白人选民比例出现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各州未上过大学的白人选民比例普遍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未上过大学的白人选民比例下降幅度较大的一些州是北部摇摆州，如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和爱荷华州。

就中期选举的投票率而言，2018 年是非凡的、几乎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清楚地表明，决定选举结果的不仅在于选民投票给谁，还在于谁出来投票。如果 2018 年热情高涨的亲民主党群体在 2020 年再次出来投票，那么很可能重现 2018 年的“蓝色浪潮”。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